

# 竞技体育赛场上的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

金羽西, 王艳琼, 任 洋, 杨 景

(广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以解读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为核心,并结合竞技体育赛场上的相关案例对两种文化进一步进行解读,以德国球星克洛泽的主动澄清、2012年伦敦奥运会羽毛球禁赛以及2005年上海世乒赛上德国名将波尔面对误判的及时纠正等案例,进一步阐述两种文化对于道德认知的深刻影响。由此认为面对追求公平公正、超越极限竞技体育追求,罪感文化的影响力显然对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更加有利。因此,罪感文化不应仅仅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也应逐步渗透到东亚文化中,为营造公平公正的竞技体育氛围奠定坚实的道德文化基础。

**关键词:**竞技体育;耻感文化;罪感文化;东亚;欧洲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15)04-0027-04

## Shame Culture and Guilt Culture of Competitive Sports Arena

JIN Yu-xi, WANG Yan-qiong, REN Yang, YANG Jing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sense of shame culture and interpret crime culture as the core, combined with the related case of competitive sports arena for furth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o cultures, the German star Miroslav Josef Klose initiative to clarify, in 2012 London Olympics and the 2005 Shanghai badminton suspended German champion Boer face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and promptly correct a miscarriage of justice and other cases, further elaborated the two cultures profound impact on the moral cognition. Thus, I believe that the face of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beyond the limits of the pursuit of competitive sports, the influence of guilt culture apparently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a more favorable competitive sports. Therefore, guilt culture should not only become the mainstream culture in Western society; it should gradually penetrate into East Asian culture,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reating an ethical culture fair competitive sports atmosphere.

**Key words:** sports; shame culture; guilt culture; East Asia; Europe

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同时变得有些功利,甚至有些乏味。特别是竞技体育不断追求职业化的今天,与顾拜旦“奥林匹克精神”的定义已经渐行渐远。这种变化与不同的文化传承不无关系,在竞技体育的赛场上,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竞技体育多为“利益而战”而非“荣誉之争”,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其原因,且追根溯源不难发现传承罪感文化的西方社会与传承耻感文化的东亚社会,在本质上存在着差异性。因此,笔者认为耻感文化的传承必然导致竞技体育赛场上频发的投机取巧、胜者为王等功利性心态;而罪感文化的传承则可以警示竞技体育的参与者,保持谦逊自律、公平竞争、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虔诚心态。因此,就东亚社会而言,不仅是职业化日趋加速的竞技体育项目,即使是那些尚未走上职业化道路的竞技体育项目,也应该培

养其从业者的罪感文化,而非简单的传承耻感文化。

## 1 两种文化的辨析

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路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所著的《菊与刀》一书中。然而,该作品的研究背景是二战时期的日本,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学术界的争议。但最终随着社会学、宗教文化、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深入,学术界对此观点也逐步走向认同。本文正是基于学术研究对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对竞技体育领域的相关现象加以论述。

### 1.1 耻感文化

关于耻感文化,路丝·本尼迪克特在其《菊与刀》中的解释为: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

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sup>[1]</sup>通俗来说,耻感文化就是某人做了坏事,环顾四周,若无人发现,便心安理得,暗自窃喜;若不幸被人看到,随即表现出羞愧难当,自惭形愧。可以说这种羞耻感主要源于外部的压力,是被动强行产生的由外而内的耻感。其产生必须要有他人的因素,与自己的行为所形成互动。

日本耻感文化起源于日本历史上稻作文化所需的共同体意识、儒家思想以及多神教等因素。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他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名著《菊与刀》中就认定日本的道德标准取决于一个“耻”字。耻感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儒家文化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同等重要。与个人自觉修养的“仁”所不同,“礼”更多强调的是对人的外在约束。在强调自身修养与外在约束同样重要的背景下,人们开始习惯于外在的约束,在意于外在的约束。形成了“爱面子”的心理。耻感只有在外在的约束下,受到外界的压力后才会产生。

### 1.2 罪感文化

关于罪感文化,路丝·本尼迪克特在其《菊与刀》中的解释为:公认的道德标准借助于外部强制力来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sup>[1]</sup>通俗来说,罪感文化就是某人做了不好的事(或犯了错),即使没有人看到自己的行为,自己也难以逃脱良心的谴责,遂感到良心不安,甚至觉得自己是在犯罪。此时,良心告诉自己一定要纠正这个错误,真诚道歉、忏悔,甚至是谢罪。这种罪感主要源自于自身的压力,是从个人内心产生的自主力量。

罪感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基督教“罪感文化”的影响下,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在生活中的时时刻刻都在向上帝赎罪,以减轻对自己的惩罚,最终升入天国。这种心理将生活的过程视为赎罪的过程,生活中若出现错误,便会加深其罪恶感,内心为了赎罪便会自觉主动的产生罪感。

### 1.3 文化解读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分析,曾经德国总理布莱特在犹太人公墓前的惊天一跪,所表现出的是真诚忏悔与谢罪的态度,就是欧洲“罪感文化”凸显。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日本对于二战的态度,仅仅只是道歉,或者说是一种受到外部舆论后所作出的妥协,道歉之后不管对方是否接受便扬长而去,因此这种道歉并非源于内心的真诚忏悔。基于这种现实,2004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受邀出席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的纪念仪式,2014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又一次受邀出席

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纪念仪式。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日本都没能对二战所带来世界性灾难表示明确的忏悔,在这一点上日本人与德国人的态度相去甚远。不过死不认账似乎是日本民族的一大特色,就如南京大屠杀一样,在中国人未能将多种证据公诸于众的时候,日本始终不肯承认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老百姓所做出种种恶行,甚至多年来在日本的教科书中都不肯承认日本民族的侵略行为,直到这些证据被全世界所承认,才不得不低头认罪。当然,这里提到日本仅仅是作为东亚文化个例。其实,中日韩三国由于受古代中华文化影响颇深,难免将礼义廉耻看的尤为重要,这种礼义廉耻更多是来自于外部对内部的评价,更在乎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而非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而欧洲各国由于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渗透,人生来就被教化为具有强大的精神世界,人们更愿意相信神明对其的关注,而非外人对其的看法。因此,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受内心信仰的督导,不断转化外在行为,在面对是非对错时,他们在勇于承认、在追求内心安宁的同时,也是在祈求神的谅解。

## 2 绿茵场上的主动认错是作秀还是信仰

作为曾经德国队的核心人物,人们对克洛泽的大名或许并不陌生。他以精湛的球技驰骋于绿茵场之上,更以完美的人格征服了对手和世界各地的球迷。2005—2006赛季,克洛泽效力于不莱梅队,在代表不莱梅队对阵比勒菲尔德队的比赛中,他突入禁区与对方门将对抗中不慎被扑倒在地,裁判当即判罚守门员黄牌,并给予其罚点球的机会。但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克洛泽起身后主动告诉裁判,守门员是先碰到球,无意将其扑倒,因此既不应判罚点球,也不应出示黄牌。无独有偶,正如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在1986年6月22日世界杯四强决赛中,阿根廷对阵英格兰的赛场上用手攻入的进球)一样,克洛泽也同样受到过来自“上帝之手”的眷顾,但是与马拉多纳不同的是,克洛泽并没有接受“上帝之手”的垂青。转会意甲后的克洛泽,在2012年拉齐奥客场对阵那不勒斯比赛中,开场仅5分钟,拉齐奥抓住角球机会,克洛泽在与两名那不勒斯球员起跳争顶过程中将球打入球门,此时主裁判邦蒂判该球有效。该判定引发了那不勒斯球员对裁判的不满,场面一度陷入混乱。是克洛泽出面主动澄清此事,化解场上的混乱局面。克

洛泽告诉裁判,这个球其实是打到他右手手臂上才破门的,应该判为无效。克洛泽的行为放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就会产生两种不同解读。

像克洛泽这种行为几乎不会出现在东亚球员的身上,这与东亚地区自古以来的社会文化关系密切。这种行为会被东亚人解读为“作秀”,东亚人认为有空子不钻、有便宜不占、有好处不拿等类似的行为,才是真的傻。而像这种在比赛中的误判、错判也就想当然的被东亚人解读为“老天的帮忙”“运气好”……而在西方人的价值观中这一点则被彻底颠覆。这就回到东亚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耻感文化,别人没有发现我就没做,只是我运气好而已。

据媒体报道,克洛泽本人的生活也被视为是“单调乏味”的,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没有绯闻,更没有任何丑闻,这一点在高收入的足球明星中更显难能可贵。克洛泽在赛场的举动不仅化解了赛场上裁判与对方球员的尴尬局面,也为他自己赢得了西方媒体的高度评价,在西方社会文化环境下,舆论高度自由,但是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认为克洛泽在“作秀”,亦没有球迷观众认为他“傻”,有便宜不占。这与西方社会特有罪感文化不无关系,即使“好运”落到我头上,个人的道德底线也会驱使我去发现裁判的错误,及时纠正这种判罚。

### 3 奥运会羽毛球禁赛的孰是孰非

2012年8月1日,奥运会开出了最大一张罚单,世界羽联秘书长托马斯·伦丁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今天上午,世界羽联纪律委员会就此事召开了听证会。世界羽联会后宣布,于洋、王晓理(中国);金景银、金荷娜(韩国);河贞恩、金旼贞(韩国);波莉、乔哈里(印尼)被取消参赛资格”。其原因是在7月31日进行的伦敦奥运会女双羽毛球比赛中,对战双方出现了“消极比赛”的情况,而这样的比赛还引发了在场球迷的唏嘘不满。这也是奥运历史上所开出的最重罚单,消极比赛直接取消了8位参赛者的比赛资格,并被驱逐出奥运村。而对于此事件的解读,国内外也产生了不小的分歧。

在伦敦奥运会上,主教练李永波对于这张罚单不以为然,而是将责任推给了比赛规则,因为规则的漏洞给教练员的战术安排提供了参考依据,以至于教练员在赛前就对当天比赛的结果做出了预判,并做好比赛的战略部署。这种行为放在中国的体育体制内来

看,远没有这么严重。而作为央视著名主持人的白岩松,在媒体上公开表示支持中国羽毛球队,称这张罚单的开出有针对中国羽毛球队之嫌。因为近年来中国羽毛球迅速崛起,在各类国际大赛中屡获佳绩,更是成功打造出一批羽毛球国际巨星,最为成功的莫过于“超级丹”。而国际羽联为了抑制中国羽毛球项目的国际地位,不断修改赛制规则。在这一论断的引导下,在舆论的宣扬下,激发了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结,盲目表现出对于中国羽毛球队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而这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行为,不得让我们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反思,这种自古以来的强词夺理的廉耻之心真的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吗?

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结果的不可预见性,观众花钱来看现场比赛,就是希望感受现场激烈刺激的比赛氛围,当比赛的结果被某些人的个人意志所控制时,比赛也就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而作为观众,花钱买票去看比赛,看到却是一场“闹剧”,谁又考虑过作为球迷的感受,为他们的损失买单。从本质上来说,竞技体育比赛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其本质的意义,而变成了一种政治权利的产物,而作为纳税人的“球迷”却要为这种政治利益下的运动员培养机制买单。这种为赢得比赛而“不择手段”的行为若放在中国来看,再正常不过了,观众更不会为此而感到不满,只要能赢就行,至于你用什么手段赢,没有人会过多追责。而这在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中,明显就是不符合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不管你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只要做错了就必须为你的过失付出代价,只要不符合比赛规则的行为就应该受到惩罚。这种罪感文化根深蒂固的存在于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中。因此,中国羽毛球队消极比赛的行为触动了西方社会道德文化观念。

### 4 世乒赛主动纠错,罪感文化的完美诠释

2005年上海世乒赛八进四的比赛中,德国籍名将波尔对阵中国籍球员刘国正,当第七局轮换发球时,刘国正回击领先其一分的波尔一记擦边球,当时裁判并未发现,随即判波尔得分,这样的结果无疑对波尔是百利而无一害的,若维持原判波尔便能顺利晋级。令国人惊叹的是波尔本能地拒绝了这一裁决,并大方向裁判表示该球得分应属于刘国正,最终波尔无缘四强。事后有媒体采访波尔,他表示自己作为运动员自然非常想赢得比赛,但是竞技体育的公平性不应被撼动。那个擦边球速度很快,自己也确实可以赖

账,但是他却不想通过这种手段来赢得比赛,即使站在胜利的舞台上,内心也难免会有愧疚。因此,他宁可输掉比赛,也不愿遭受良心的谴责。“赢得光彩,输得坦荡”或许是对这位德国名将个人行为最好的诠释,也是这位德国名将对罪感文化最好的解读。

而这种现象在亚洲人之间的对阵比赛中却很少出现,在 2014 年结束的亚运会上就频传判罚丑闻,先是在拳击比赛中,中国选手李倩在 75 kg 级的比赛中占据绝对优势情况下由于一个搂抱动作而被告负;再到羽毛球赛场不断刮起的怪风,不仅遭到中国选手的抱怨,事后甚至有日本网友上传了证据到网上,以此证明韩国恶意操纵空调风向;最后甚至有网友公开质疑亚运会的判罚规则,频发的改判事件,似乎又一次刷新了亚运会改判的历史,例如田径女子 3000 米障碍赛中,巴林选手杰贝特在已经夺冠的情况下被判犯规,在经过中国与印度选手同时的申诉后,将金牌判给中国,随后巴林又一次申诉,辗转之后这枚金盘又回到了巴林;无独有偶,在射击比赛中,中国女队勇夺 10 米气步枪团体金牌,但是随后张彬彬被判使用的设备违规从而被取消比赛成绩,中国代表为此积极申诉,又一次将判决结果改写,最终收获了这枚女团金牌。而上述这些判决,在欧洲人的赛场上是难得一见,而在亚洲比赛中,却不得不承认是常态化的表现。这无疑是对竞技体育精神的亵渎与玷污,为了赢得比赛而不择手段,缺乏了公平的判决,亵渎着裁判执法的权威,何谈公平公正?

波尔的主动纠错显然是由于内心强大的道德底线,受到其欧洲罪感文化的熏陶,使之为了获得良心的安稳而主动纠正裁判的误判,而判读这个球是否属于擦边球也只是在 0.01 cm 之间,观众根本无法看清楚,甚至裁判都很难进行正确的判断。若波尔不主动承认,那么刘国正也没有任何证据为自己申诉。而对比亚洲竞技赛场上的种种恶行,或者在欧洲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也又一次印证了东亚文化中所特

有的耻感文化,没有人愿意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无理还要争三分,在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时,才会表现出羞愧难当的一面,但其内心并不想为此负责,否则也不会反复更改判决结果,为赢比赛不择手段。耻感文化很显然不适合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更不是竞技体育创立之初所要彰显的公平公正、超越极限的内涵。

## 5 结语

不得不承认东亚文化与欧洲文化存在的本质差异。但从竞技体育的角度出发,分析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差异性,笔者认为罪感文化更有利于竞技体育的公平公正。诚然,必须要看到两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看待事物的不同态度。而从现代竞技体育传入与发展的角度来考量,笔者认为既然承认现代体育是由欧洲传入东亚地区。那么,不妨也遵循竞技体育传入之初的文化价值,更多的以“罪感文化”来约束从业人员的个人行为、思想观念,尊重竞技体育之初的本源文化(在自由公平的竞赛氛围中,不断挑战人类运动极限)。使其在东亚这片热土上保证其公平、公正、公开,实现其体育本源文化传承。

## 参考文献

- [1]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日本人的柔美与暴力[M]. 廖源,译.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
- [2] 胡凡. 论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形成[J]. 学习与探索, 1997(1): 136-142.
- [3] 舍勒. 价值的颠覆[M]. 曹卫东,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 [4] 李亦园, 杨国枢. 中国人的性格[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江国平]